

南宋时期的“赣州咸淳四年六月”中窑烧造修城砖使”(侧面亦有铭文“徐收”)这款铭文城砖是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馆藏的孤品。另据赣州市博物馆资料显示,还曾发现有“赣州咸淳四年六月”窑烧造修城砖使”铭文城砖。如此,便印证了当年修城的规模较大,以至于对砖的需求使得多个窑场同时进行。

罕见的是,该款铭文城砖巧妙地融合了五个称谓,代表地名的“赣州”,代表纪年纪月的“咸淳四年六月”,代表密务的“中密”,代表人名的“徐收”,代表功能的“城砖使”,是赣州城铭铭文砖中颇为典型的代表作之一。

咸淳四年

襄阳告急,赣城加修

南宋咸淳四年(1268年)六月,此时的时局动荡不安。缓过劲来的蒙古大军,在忽必烈的授意下,由都元帅阿术率领大军进攻襄阳。襄阳自古以来为扼守中原的门户,所谓得襄阳者得天下。南宋和元朝都把国运之注下在了这场耗时6年直到咸淳十年(1274年)才结束的围城战役中,史称“襄阳保卫战”。而此战,也最终在城破失守后画上句号,从而吹响了南宋的灭亡曲。

赣州,虽远在千里之外,已然感知到危机,包括赣州府城和南安府城都同时进行了浩大的修城运动。据《南安府志》记载,咸淳四年修城池之后,南安府城池的格局已然落定,城墙高二丈,女墙五尺,垛1500个,警铺34个,总面积1200亩,内有马道,外有护脚,濠深五尺,宽一丈。设有四座城门,城池周长有十里一百五步(约5075米)。

如此,我们反观咸淳年间的赣州,却意外地发现如暴风雨前的平静,与南宋其他时间混乱不堪不同,有着难得的岁丰人和。

咸淳元年

仁德治理 何子举

据《全宋文》记载,咸淳元年知赣州者为何子举。何子举,婺州永康人(今浙江金华)。是南宋时著名政治家,主战派官员。淳祐七年(1247年)自大学登进士。宝祐、开庆年间累官军器大监、兼左司郎官,知赣州。

何子举非一般人,在朝野之中颇有建树和影响。早在1259年,忽必烈再次率军南下,南宋危急,朝野大乱,宦官董宋臣主张宋理宗迁都明州,何子举、文天祥等极力反对。《宋季三朝要略》载:“军器大监兼左司何子举言于丞相吴潜曰:若上行幸时,则京城百万生灵,何所依赖?必不可。遂与俱入见,面陈割切。”

景定年间,宋理宗因吴潜反对设立度宗(赵禔)为太子,下诏罪责吴潜党人。枢密丞何子举因有“储君未愆众望,建立之议,固当详审”而被牵连。《宋史全文》刑部言:“吴潜、丁大全两党人内已置移……何子举押归本贯。”景定四年(1263年),何子举被以吴潜党人身份贬谪,押归籍贯地。

据《辅治忠直留丹心》记载,何子举于咸淳元年(1265年)被任命为赣州知州。此时,正值南宋末年,社会动荡,苛捐杂税繁重,赣州的百姓贫苦,当地盗贼猖獗,骚乱不断。何子举通过“内施以仁,外行以德”的治理策略,减轻赋税、发展农业,又平定地方叛乱。

咸淳二年

稻开二穗 政乎人和

南宋咸淳二年(1266年)赣州郡守翁合,字与可,一字叔备,号丹山,崇安(今福建武夷山市)人,嘉熙二年(1238年)进士。宝祐年间知邵武军,累官浙西提刑、国子司业、进祭酒。景定五年(1264年)擢侍讲,迁中书舍人、直舍人院。咸淳中,知赣州兼江西提刑,德祐元年(1275年)特授礼部侍郎,官终礼部尚书。著有《古今绝唱》《丹山集》。

步入咸淳年间,朝野之间弥漫着一般莫名的祥和。在那年,赣州发现一株稻子长了二穗,遂称为太平盛世的祥瑞。“宋咸淳之明年,丹山翁公合守赣,越三月,政乎人和,有禾穗于境内,一穗二米,瑞也。”赣州的百姓把这种祥瑞迹象归功于郡守翁合,“赣父老以闻,归其瑞于太守,太守不有”。而翁合则是把这一祥瑞归结为朝廷,称颂圣贤汇聚才有此祥瑞,“是年九月,上将有事于明堂。公曰:‘此圣贤会之征也,此人地肇理之符也,守何力之有。’”

于是文人骚动,特作《嘉禾颂》(元·王义山)以记。“……彼美者禾,瑞于章贡;太守谓谁,丹山之凤。一穗二米,其名曰秔;不种而生,奇之又奇。我闻崆峒,麦秀且黄;孰若兹禾,有馥其芳。又闻武夷,尝产兹瑞;厥瑞伊何,十五其穗。曷不于他,于武夷之乡;曷不于他,于章贡之邦。惟我丹山,武夷之秀;惟我丹山,章贡之守。合二郡之瑞,瑞于一时……”

对于翁合治理地方的能力,皇帝在给他的诏书里也有所夸赞:其治郡有能名,制部有风力。

关于翁合,文天祥对其的评价极高,《宋元学案补遗——侍讲翁先生合》中有记载。文天祥在给翁合的信中说,自己只是一个吉安白鹭书院的书生,对学问只是初窥门径。但是,翁合的精神气质、言谈举止以及他的学问文章,都深深地影响了他,使他受益匪浅。在另一封信中,文天祥说,自从翁合在朝廷中振兴文风以来,他就像手持文印的明灯,照亮了四海。国家的诏令典章,都因他的努力而更加完善。

咸淳六年

岁丰人和 修祠修桥

南宋咸淳六年(1270年)知赣州者为李雷应,字震亨,号楼峯,饶州浮梁人(今江西景德镇市)。宝祐四年(1256年)进士,与文天祥同榜。咸淳六年,曾任宗正寺丞,知赣州。咸淳七年四月,提点荆湖南路刑狱。咸淳九年,除湖北转运使兼知鄂州。官至大府丞。

文天祥在《重修嘉济庙记》中描绘李雷应来到赣州时的景象时说:“赣地大而俗器,山宽而田狭。俗器故易以讷(同喑),田狭故易以饥。侯未至以为难,将至以为忧。”人们对赣州的印象向来都是山高田少、民风彪悍、素难治理。但当李雷应来到时却是另外一番“青雨霏流,嘉气坌集,民声大和,四郊以宁”的景象,李雷应非常意外而高兴,却不知道为什么。乡人说是因为有嘉济庙的保佑,于是,李雷应筹资重修了嘉济庙,并请文天祥题记。

李雷应还在任上看到纪念赵抃的赵公祠“岁时妥侑,习为故常。屋弊且压,神不顾享”,于是决定修缮,也是请文天祥题记。文天祥评价,李雷应任上百姓安乐风调雨顺,朝廷也没有增加赋税,李公清廉勤政崇德重风,“风示邦人,以纾教思,其渊源有自来哉”。

李雷应在修完祠庙之后,因为节俭用度,筹措的资金还有剩余,就修建道路以方便百姓往来,同时还修缮了两座浮桥以方便人们渡江。这些工程耗资共计两百多万钱,两百多石粮食,全都是出自李雷应自筹的款项,并没有给百姓增加负担。

李雷应的治理下,赣州城“粟米在市,口麦满野,鸡犬相闻,达于岭表”,和他来时一样的安祥和好。

百姓歌之曰:“奕奕庙貌,我侯新之。侯为我民,匪神是私。田有稻粱,野无干戈。微侯之赐,胡以室家?屡舞口号,伐鼓渊渊。何以报侯,万有千年。”

结语

我们从咸淳二年翁合治理赣州时的“稻开二穗”,获知到百姓对于政乎人和现状的满足;从咸淳六年李雷应治理赣州时的重修嘉济庙事件中,知道了岁丰人和的幸福。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“田有稻粱,野无干戈”现状的无比满足和珍惜。

可就在赣州百姓感叹如此难得的太平世道时,身在临安的人们却陷入了蒙古大军进攻襄阳,江南发岌可危的慌乱中。谁又能想到,不久之后,宋廷不保,数万赣州子弟随着文天祥奔赴沙场几无生还,不禁让人唏嘘。



明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,海瑞浙江淳安知县任满,考评却未能晋升,而是改任地处偏僻的兴国知县。这年的腊月二十七,海瑞风尘仆仆地抵达兴国接任新职,这一天他正好年满50岁。

海瑞到任时,兴国由于连年水旱灾害,粮食歉收,加之赋税沉重,盗贼横行,大批农民难以度日,纷纷逃往外地谋生。海瑞看到的是满目疮痍,岁征赋役银两收不满一半的兴国。

海瑞对善良的兴国农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,到任后,勤政爱民、励精图治,他办了简政恤民、剿匪练兵、法办二张、兴修水利等四件大事,不到两年的时间,就把兴国治理得井井有条。

海瑞清廉治兴国

□胡玉春

简政恤民

海瑞的简政恤民,是把当时兴国县内官府侵扰贫民的积弊革除。他发现兴国县的行政治理上,存在“日屯田、日地利、日隘所、日均赋役、日红站马船、日招抚逃民、日哨官、日革冗员”等八大积弊,像八座沉重的大山,压得百姓流离失所,造成兴国社会不聊生。

屯田。指当时兴国普遍存在的军户侵占民田现象。弘治末年清查时,兴国屯军生奸作弊,“指邻近民田报作己力开垦,遂增余田各目。查得屯田原一千余三十亩,今余田数约六千余亩,当正田三分之一”(明代《黄册原文》)。加上军屯水冲沙淤、水抛抛荒而把间杂于军田中的民田算作屯田,海瑞估算了一下,兴国全县军户兼并民田有一万亩以上。屯田军户实际并不耕田,而是由农民代耕,军户坐享其成,年深日久,军户人丁日多,农民不堪重负,纷纷抛弃土地,逃往他乡。

地利。指当时兴国县有大量土地荒芜,可供招抚流民开垦。由于军户欺压,兴国农民逃往他乡避祸,海瑞估算全县还有可供万户农民耕种的土地不能利用。

隘所。兴国全县当时设有18处隘所,驻扎官兵。他们多设在无用之地,不能诿奸缉盗,却能吓唬商民,敲诈勒索。海瑞认为这种情况有万分之害,无一分之力。后来经海瑞整顿,撤销了8所。

均赋役。指当时盘踞兴国的豪绅地主,通过巧立名目,把朝廷征收的赋税徭役,全部转嫁给贫苦农民的丑恶现象。

红站马船。明朝政府在各地交通要道,分别设立了水、马驿站及驿递所、急递铺,主要用于递送使客、飞报军务、转运军需物资。文武官赴任、还乡、省亲、巡察均可使用驿运马匹和船只。驿运所需船、马、人夫及吃、住所需,均由沿路地方及百姓供应。由于官吏假公济私,本非公差,本是私物,也通过驿运运载,并于沿途横加勒索;地方官为了巴结往来官员,也尽力搜刮民财,逢迎过客,使驿递费用日重。地方官员遂将沿途百姓,编在红站马船名下,额外加征费用,使当地百姓不堪负担。

招抚逃民。海瑞发现兴国农民因虚粮赔累等种种原因,弃籍逃亡者甚多,全县百姓编户57里,实则人丁不足一半,人烟寂寥,村里萧条。因此,招抚逃民户籍复耕成为急务。

哨官。当时兴国乡村遍设哨官一职,类似于民兵头领。按上司要求应“攫取家道殷实有武艺之人”担任,而当时兴国各地哨官则是家非殷实,又无武艺的膏粱子弟,因而造成与机兵“心非亲爱”,“于操正无分毫之役,各机兵酒食之需,各统兵诸员拜见之礼,各衙门人役常例之索,开一骗局不小也”。上述费用均通过哨官向当地百姓摊派,哨官遂成为扰民之祸根。

革冗员。冗员即多余的官吏。兴国县当时人口逃亡过半,户籍虚空,致使本来就不愿意做事的衙门和胥吏更加无所事事,挖空心思去勒索百姓。

海瑞将上述弊端危害和改革办法整理成《兴国八议》,提出对赋役要均摊,对军争民田要纠正,对逃民要招抚,对隘所要精简,对冗官和冗员要革除,他还撤并了8处巡检司,每司弓兵100名,并主张采取怀柔政策吸引流民来兴国垦荒。海瑞的《兴国八议》在奏明南赣巡抚吴百朋得到许可后,迅速在兴国县一一施行,减轻了人民的沉重负担,抑制了豪强对贫民的欺压,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全县很快便呈现政通人和、百废俱兴的清明局面。

剿匪练兵

兴国县地僻山险,自古匪患难靖。海瑞到任时,兴国境内逃亡百姓,成群结队上山成盗,于险隘处构筑山寨十余处,经常出寨下山,打家劫舍。造成商旅难行,民生凋敝。海瑞不避凶险,假扮相士,亲赴匪寨,说服匪魁,用招抚之法,将全县匪患,一一平息。

为了彻底安定地方,海瑞向上司呈《留民壮文》,增加了维护县城治安的民壮(类似于民兵的组织)数量。同时为提高民壮素质,他捐俸倡修教场,以训练民壮。据县志记载,海瑞在兴国曾经亲自带头捐俸“重修教场”(即民兵训练的场地)。海瑞主修的教场,位于兴国县城东北的凤凰村口,今称教场冈。他对教场图式、操练阵法及程序、具体要求,均一一亲自订定,教场冈至今仍为兴国县城的体育场。海瑞倡修教场的同时,还雇技师精造鸟銃100把,购买佛郎机20门,用于装备民



(AIGC图片)

壮,还为民壮添置了其他兵械。佛郎机是明朝从海外引进的一种射程可达2000公尺的小型火炮,当时属于现代化武器。兴国县城的防守能力因此大大增强。

海瑞通过招安土匪和增强民壮军械的措施,使兴国境内很快实现社会安定、客商充斥于途、百姓安居乐业的和平气象。据兴国县志记载,兴国此后70年里都没有发生战事。

法办二张

海瑞任兴国知县这一年的夏五月,奸相严嵩以罪免职,朝廷同时将其子严世蕃谪戍雷州卫。严世蕃没有去雷州服役,潜回家乡江西袁州,征集数千民夫建造府第。为筹备建筑材料,严世蕃派出张魁、张豹两兄弟,来到兴国购买木料。二张于嘉靖四十二年(1563年)夏抵兴国。二张自恃是原兵部尚书张璠的侄儿,在兴国耀武扬威,购买木料时,对山户施展强盗手腕,买木材不给钱。当山户元规、元维向二张讨要木材款时,张魁、张豹不仅拒不认帐,还动手打人。双方发生争执,二张反而派人上山县衙诬告,诬称二元打劫了他们的钱财。

海瑞受理了这桩案子后,因为牵涉到官宦亲属,特别慎重。他根据双方诉状和证人证词,弄清了案情的真相——张魁、张豹买木料拒付银两,还诬告良民。海瑞派出皂隶传唤张魁、张豹到案,但二张公然拒传。几天后,张豹未经传唤又直奔县衙,竟然登堂入室自行辩说。海瑞命衙役拿下张豹,送到赣州府二罪并治。

在南昌养老享福的张璠,亲自写信向海瑞求情,海瑞不理。张璠又四处写信,并频频接待在南昌过往、逗留的赣州的按、道、府各级官员,嘱托代为解救。其中,赣州府主审官的赵推官,以及管刑属的书记钟齐朝、黄春魂等人,在财物贿赂和升官利诱下,将张豹判成无罪。

海瑞不因为自己官卑人微就此气馁,向军门吴百朋和赣州守巡道各衙申诉,要求主持公道。他在《申军门吴尧山并守巡道请改招洋文》中写道,“今日卑县有不得不言者,民冤之甚而合县之人不服也!”“夫士君子行政,要在服人之心,不在服人之口。”“上司职重在锄强抑暴”,应该为冤民作主而改招。

在海瑞的据理力争和百姓的强烈呼吁下,上司终于再将二张重新收监判罪,兴国百姓闻讯无不拍手称快。

兴修水利

兴国处在山区,晴天易旱,雨天易涝。海瑞对兴国的堤坝圳圳等有关农业的水利设施十分关注,他号召兴国百姓多开凿堤坝塘圳。此外,据兴国县志记载,海瑞还亲自办了两件好事。

一是开水渠,筑水陂,挖山塘。嘉靖四十二年春夏之交,海瑞到距县城70里的宝城乡回龙村(今城冈乡回龙村),发现山洞里水流潺潺,平坝上正在抽穗扬花的水稻田里却涸裂干涸。海瑞马上召集里长、甲首商议,拟在山洞内筑水陂,沿山开水渠,灌溉坝上的农田。里长、甲首当然深表拥护。

在海瑞督率下,工程顺利进行,很快开成了一条“长十余里,阔三尺,深尺余。灌溉田租千余石”的水渠。并挖筑了多处山塘和水陂。当地

百姓为了纪念他,将此灌溉系统命名为“海公陂”。至今回龙村萧氏族谱中,仍保留了赞扬海瑞督率村民修筑陂圳的诗文:

海公圳

钟秀元(邑庠生)

僻境何缘区画周,惟公垂泽自悠悠。凿沟灌溉四千顷,拜祝生香稻一畴。朴野岂忘遗爱在,高风应共蔽棠留。碧流曲屈浑如带,俯听寒声夜未休。

二是植树护堤。海瑞到兴国任职前,兴国城东发生水患,淹没了城池。嘉靖四十二年春二月,海瑞率领绅民,在城东培土为坝,植松万株,解除了兴国县城的水患之忧,海瑞将坝起名为“万松坝”。他离开兴国后,百姓称之“瑞州坝”。

从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到嘉靖四十三年十月,海瑞任兴国知县共23个月,由于他清廉恤民,兴国县由大乱而大治,政治清明,百业兴旺,人口增多,生产发展。嘉靖四十三年秋,吏部陆光祖考选地方官,发现了海瑞特行卓识,以“稿军之功”调海瑞任京官,授职户部云南司主事,官阶由正七品晋升到正六品。

嘉靖四十四年三月,秋高气爽,海瑞带着两个随从,轻车简从赶赴北京就任新职。海瑞动身北上的那一天,兴国县城的十字街人山人海。人们箪食壶浆,炳烛焚香,为海知县送行、饯别。

兴国百姓与海瑞难舍难分,“公之始去也,老稚卧辙下,拥公车不得行”。

海瑞治理兴国县,虽然不足两年,但他却在此践行并形成了“恤民”思想,他将自己治理兴国的所思所想刻印成册,起名为《治兴遗文》,流播后代。虽然书稿未能保存下来,但在兴国的县志中,保留了《治兴遗文》的主要篇目:《兴国八议》《申吴军门便宜五事》《留民壮申文》《申军门吴尧山并守巡道请改招洋文》《谕老人》《复王七峰琼山知县》《复淳安大尹郑》《诗·赠萧钰》《诗·恤农笔》。

海瑞离开兴国后,百姓绘其像供奉,并集资在县城尊经阁为其建生祠。后祠堂年久失修,百姓再将其塑像迎到县城卢公祠内,与明初兴国另一位贤令卢宁合祀。明万历丁未年(1607年),在海瑞离开兴国40余年后,岭北观察龚道立提议,知县王芮引导全县绅民集资,修建了海公忠祠,全县官民四时祭祀,诸事皆以海瑞为楷模。凡遇官府行便民之策,百姓必曰“此忠介之所为也”;凡遇官府出现扰民之弊,百姓必曰“此忠介之所革也”。

清康熙四十三年(1704年),吴江张尚瑗任兴国县令时,他的父亲请朱竹垞先生(朱彝尊)书“学海”两个大字让他带到任上,命张尚瑗在任上务必以海瑞为师。张尚瑗到任后,在县衙大堂上悬匾“学海堂”,处处事事效法海瑞。张尚瑗在兴国任职12年,在其离任后,后任的县令均不敢将衙门上的“学海堂”匾取下。效仿海瑞的为官为人之道,成为兴国县清代历任县令的惯例,海瑞治兴遗风也在兴国县浩荡吹数百年。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,兴国县城最繁华的街道,曾被命名为海瑞路,直到1966年改名为东风路。1982年一度恢复海瑞路原名,现在叫背街。兴国县三僚村廖氏的族祠内,镌刻了海瑞画像,至今仍供奉香火。海瑞治理兴国时表现的“恤民”思想,在兴国社会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。